

Civi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

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

Rebekah Nathan



读懂大学新一代

[美] 丽贝卡·纳珊 著 张至璋 译 韩侃瑶 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Civi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唐磊 主编

读懂大学 新一代

[美] 丽贝卡·纳珊 著

张至璋 译 韩侃瑶 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懂大学新一代/(美)纳珊著;张至璋译.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1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ISBN 978-7-5545-2009-3

I. ①读… II. ①纳… ②张…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7183号

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 by Rebekah Nath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2005 by Rebekah Nathan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
本书译文由立绪文化出版公司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All rights reserved.
冀图登字: 03-2014-107

丛 书 名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丛书主编 唐 磊

书 名 读懂大学新一代

作 者 [美] 丽贝卡·纳珊

译 者 张至璋

校 者 韩侃瑶

责任编辑 姬璐璐

装帧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2009-3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因 持续的兴趣和想继续接受教育的缘故，我旁听了一些课程，在这以后，做此项研究的想法才真正明确起来。在两个学期里，我上了其他院系的课。像教室里的其他学生一样，我很自然地按时坐进教室，阅读材料，有时还举手发问。我发现这使我变成了学生。也就是说，因为我像学生一样同老师相处，而且举止也如同学生，所以我的默认身份也已经是学生了。我在不经意间发现，如果我走路像只鸭子，也会像鸭子那样嘎嘎叫，那么人们就会认为我是只鸭子。我的同学开始和我谈论对事物的看法，并说些闲话。我当教授时对此从未有所耳闻。

我开始认识到，即使年逾五十，我仍能是个大学生，也多少能被别的学生当作伙伴。这种新身份对我刚萌芽的研究念头来说似乎太重要了。因为其他教授已成功地研究了校园生活，所以我想尽可能地学生的视角来审视校园。我当然不想在教授的身份下与同学、舍友和教授相处。戏剧化的是，我在旁听课程时，常会听到一些谈话，它们与我在教课时所听到的极为不同。我并不想我的研究

偏离原题而进入到照本宣科的对话中（正是这种对话描绘了教授与学生之间的话语特性）。我察觉到，如果仅以一个兴致勃勃的教授的身份来“进行研究”，那么我想要洞察的世界将满是荆棘，滞碍难行。于是我决定通过正式申请大学、注册修习课程以及搬入宿舍来变成一个学生……由此做好准备，以“观察—采访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去观察大学生活。

教授返回自己的大学当大一新生，却不告诉任何人她是个教授。关于上述情节的书会招致无数质疑，特别是来自民族志学者和学习民族志的学生。人类学者可以合理地化装刺探吗？这样的研究人员在自己的身份问题上是不是在骗人？大学同意她这么做吗？她对她的学术研究委员会如何交代？有没有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此外还有方法论和表述方式上的问题。一个尚未完全表明自己身份的研究员，能不能在她的田野笔记中写下任何的亲身经验？能不能记录下别人在她面前说的任何事？她可不可以出版公布这些事？正如一个该手稿的审阅者所提示的，民族志首先应该取决于土著居民说什么以及如何说。那么，为什么这本民族志中只有若干章节有不少引用，而其他部分则充满了作者自己的叙述呢？匿名的问题更是加剧了窘境。再三思虑后，我最后选择不说出我的名字和我的大学校名。那么，读者打算怎样去理解我的选择呢？

虽然我在书中多多少少回答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读者若想知道更多，我也愿意做出更充分的说明。在本书的后记《伦理学与民族志》中，我还额外探讨了在撰写关于“某大”（“AnyU”，我的大学的化名）的书时，为何决定以“丽贝卡·内森”（Rebekah Nathan）为笔名。

不论是在对学术批判的回应能力方面还是作者对自身的认可方面，这项决定都使事情变得复杂。为了维持匿名身份，我只能以匿名的方式来说明我对他们的感谢：感谢琳达、凯、克劳迪娅对于手稿早期的反馈和鼓励；感谢迪克的勇敢和信赖促进了我的课堂研究；感谢公共电台的安帮助我记录，并对我的经历进行思考；感谢菲力斯在我住校一年期间的支持和耐心；感谢我那即将上大学的侄女丽贝卡和侄子内森允许我借用他们的名字合成笔名；还要感谢“某大”出色的学生们，是他们把我当成学生来指导、劝告、帮助和鼓舞。

在此，只有一个人我能以全名来感谢，我非常感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弗朗西丝·本森。人们虽然能够预想一种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关系虽属于此但又比之罕见，它的合作性、生产性、诚实性和持续性滋养了富有创造力的过程。我们在华盛顿市时，本书的研究计划在我心中还只是个模糊的构想，但弗朗西丝在听我说了几小时后，便鼓励我冒险打破终生的研究计划，去从事这项民族志研究。在本书粗具大纲时，我们在纽约相会，讨论内容发展。完成初稿后，她热心地与我讨论匿名问题。匿名问题可能会给学术出版物带来麻烦。但愿每位写书的教授都能找到像弗朗西丝这样的编辑，这样有智慧的合作伙伴。

目 录

第一章 欢迎来到“某大” / 1

第二章 住宿生活 / 22

第三章 共同体与多样性 / 47

第四章 外人如何看美国大学生 / 75

第五章 在学术上 / 99

第六章 大学生活的管理艺术 / 118

第七章 重读大一的收获 / 146

后 记 伦理学与民族志 / 174

译后记 社会功能的守护者 / 186

校后记 / 190

注 释 / 192

第一章 欢迎来到“某大”

十年前，我绝不会想到会写一本书来谈有关我在“某大”的学生生涯。我是个文化人类学者，毕生大部分的职业生涯发生在美国之外的一个偏远乡村里（不对该村命名是为了维持一切匿名这一规定）。我在那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语言与习俗。作为一个传统的文化人类学者，我在多年时间里参与并观察村庄生活。我加入村里的组织，采访当地人，还跟他们建立起长久的人际关系。我写作民族志^①，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写出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情况，就是希望能捕捉到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从村庄生活到宿舍生活真是个大跳跃，然而也许正是如此反倒使我找到撰写本书的一些理由。

①民族志，是一种写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田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本书的页下注无特殊情况均为译者注，如有其他类型注释另行标注。）

任何久居海外的人都知道，异国的生活经验促使人们回顾自己的文化，会使你成为观察者，观察自己曾经历过的一切。一旦你从别的世界回来，原本在这儿不会引起你注意的事，似乎变得新鲜起来。举个例子，就像翻看记事本一样。本来这在美国生活中是稀松平常之事，现在反倒是重新浮现为异域他者的习俗了。由于海外的时光，我发现自己在不断解构自己的生活世界，而曾经我却认为这个世界是理所当然的。最终我还把这种倾向发展成为一门讨论美国文化的课程。在这门课里，我引导我的学生用人类学者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文化，从而带着新鲜感、激情和相对的眼光去重新检视存于文化中的问题和困惑。想到我的学术体验，我决定还是采纳我自己的建议。

在大学教了超过十五年的书后，我发现我对学生越来越不解。为什么那些大学生除了有必要解决的课业问题外，不再在我的办公时间来拜访我？为什么他们对我真诚的邀请——在我指导下做些课外研究——没有反应？为什么在我进行大班授课时，有些学生不做笔记？怎么居然有学生带了整套午餐进教室，并在课上吃喝？为什么班上有些学生把头或脚搁在书桌上开始打盹，却丝毫不觉得难为情？

我发现自己同卡洛琳·西格尔的讽刺文章一起，对学生晚交作业或是逃课时所给出的借口不禁莞尔，包括无所不在的“我的室友吐血了”。^[1]对于一位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教授的公开哀叹，我深有同感。他质疑当前本科生教育的质量，甚至将矛头直指他所在的这所精英大学。^[2]

当我和我的同事继续努力去理解这些看起来奇怪的行为时，

我开始记下同事和我自己的谈话。以前我们也像他们那样子吗？还是今日的学生不同了？他们看上去不是总爱骗人吗？不是更加粗鲁吗？不是更加消极吗？他们不是更加自我了吗？为什么当我们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时，感觉比拔牙还难受？为什么我的学生不做课前阅读作业，来使我们拥有一个像样的课堂讨论？尽管在事实上我们能找出其他的故事，诸如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诸如“啊，原来如此”等豁然开朗的体验，诸如我在课程结束两年之后收到了学生的感谢信，但是上述的疑问仍然不胜枚举。

由于当代大学将“以学生为中心”奉为圭臬，因此学生对于他们的教育所持的态度，于我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大学教授越来越常听到，大学行政部门的口吻好像是企业经理，他们认为自己身处教育商场，正在为学生顾客而竞争。大学的行政部门除了照顾学生住校、注册入学，以及使学生感到亲切舒适之外，他们也在改变课程设置、教育法则、时间安排和学位设定，代之以迎合学生的口味，满足学生的欲望，以便吸引更多学生入学。在这种气氛中，学生的需求，以及他们对教育的理解，正在现代大学的塑形中起着更为中心的作用。

我做此项研究的动力迸发于我旁听同事课程之时。我对这种旁听期待已久，得到指导教师的允许后，我参加了计算机设计课及佛教课。这两班的课程内容显然大异其趣，吸引的也是不同兴趣的学生。虽然我跳过写论文、参加测试以及其他的衡量举措，但我还是按时上课、做笔记、读书。我在活页本上做笔记，举手发问，坐在位子上静候老师进入教室。我觉得这样已足够让我看起来像个大学生，即使是个老学生。让我意外的是，当我被其他大学生扯进对话时，

我开始听到从未耳闻的谈话：“嘘……嘘……打扰一下，你星期五来上课吗？我不能来，要翘课去滑雪。回来后能不能借一下你的笔记？”“嗨，你知道他说这次考试要怎么进行吗？他给我们说时我正开小差。”“一个星期里，又交报告又考试的，你觉得公平？”

打个比方来说，我很快渐渐明白我已经穿过了试衣镜，秘密进入了学生在过去通常不会告诉我的世界。我听到了周末聚会的种种故事，比如，某人如何在凌晨3点到4点半，醉醺醺地写完作业。我还听到他们谈论老师给分是如何不公平，以及为什么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上那么多通识课程？我做了学生，自然而然开始听到那么多对话，而且各种对话的内容、形式和语调皆不相同，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大家谈话之际，把一句句只言片语记在笔记本上，以免事后忘记对话的主题。“我是说，你什么时候曾在鸡尾酒派对上用到过尼采？”在我的记载中，这是首度有人认为不值得在哲学课上花费时间。

我明白，我又开始研究民族志了，而且是用人类学者的眼光去审视我的经历，之后我突然想到，这个真正变成大学生的主意，可以作为一项研究项目在我的休假年^①中进行。在一个研究建议中，我对美国文化、变化的美国大学以及本科生的兴趣攀至了顶点，此提议便是作为一个大一新生在自己的大学里学习。

我所规划的研究问题比较常规：作为公立大学的一个样板，“某大”当前的文化是什么？当代美国大学生对教育的理解如何？他们希望从中得到什么？他们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大学真正教了他们什么？

^①休假年指美国一些高校的老师每七年可享受一个带薪的休假年。

我不是着手进行这项计划的第一人。人类学教授迈克·莫法特 (Michael Moffatt) 写了一本富有价值的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学生生活民族志, 我经常在教美国文化课程时引用。我在2002年到2003年间见证了他的观察, 他的观察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历史中重要的一页。莫法特是在1977年到1987年这十年间, 通过朴实地研究与他处于不同代际的大学生, 执行了他的田野调查。他的记述, 与其他一些重要文献一同是我评判大学生文化的改变和延续性的有用依据。这些重要文献是海伦·莱夫科维茨·霍洛维茨 (Helen Lefkowitz Horowitz) 写的有关她在校园的生活史, 以及桃乐茜·霍兰德 (Dorothy Holland) 和玛格丽特·艾森哈特 (Margaret Eisenhart) 对大学女生的调查。^[3]

我当然也考虑到, 我可能会对早期的作品有所偏见。作为女性, 我期望我用来观察校园生活的视界会断然与莫法特的男性视角不同, 男性视角对性尤为重视。作为读者, 你会发现其中的若干主题受到忽视。例如, 希腊式生活 (Greek life)^①, 约会和性生活, 家长和学生, 走读生, 体育运动等。^[4]其理由并非这些主题对大学文化不重要, 而是在我所强调的话题中, 我们关于“大学”经典观念是包含各种观念的世界, 一个多样性、共同体和完整性被培育起来的住所。我想看看美国大学生文化如何与美国大学制度结合, 包括我们对它的幻想, 以及它的使命和未来。

为了达成这项任务, 与早先的民族志相比, 我在“参与者—

^①Greek life中的Greek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指的是一些联谊会, 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兄弟会、姐妹会, 这些联谊会的名字会用古希腊文来标示, 因此把其叫作希腊生活或希腊团体, 但实际上与古希腊毫不相关。——校者注

观察者”研究方法中更加重视“亲身参与”。尽管这两种研究都相似地依赖于采访学生以及通过从旁观察来获得资料，但在前者中，研究者把自己定位为教授。^[5]因此我决定每天都融入其中，与他们一起上课，住学生宿舍，像个老学生般和他们相处。

2002年春季，我以未定专业学生的身份，仅利用我的高中成绩单作为我的学历证明，申请了我自己的大学——“某大”。我很快被接受了，还接到“欢迎加入‘某大’”的信函和一套资料，其关于学费支付，膳食和住校计划，所有大一新生必须参加的“学前适应性训练”，以及我可能会想参加的、非强制性的学前激流泛舟和登山活动。

我在参考若干意见后，决定尽可能依照为大一新生制定的脚本参加活动。我像多数大一新生一样，选择住校，而且参加学校的伙食计划。我选择了位于校园中心地带的男女混住宿舍（多是十九岁到二十岁的学生），并且向校方请求住单间，结果获得批准。^[6]

我上交了我的申请表去参加为期两天的“学前适应性训练”。“学前适应性训练”通常由父母陪伴，接受校方在开学前对大学课业和生活的介绍。我计划好，开学前一周先搬进学校住，以便参加为欢迎新生和旧生返校而举办的“欢迎周”。我犹疑再三，最后还是从我的车上撕下了原有的教授停车证，并收藏好我的教授证。我已准备妥当，回到大一，当个新生了。

我怎样表现自己

在本科生申请流程中，我开始在生活中谨慎地平衡着真实身

份与杜撰身份。我依规定向学校列出所有我想去的学院以及想得到的学位。^[7]显然，如果我以宣布我是个大学教授的方式走入大学生活，我在原定计划的执行上便会有所妥协，以致达不到某些目标。我想以学生的身份，即使是作为一个教授的老学生，一个“返校”^[8]的老学生，去发现校园生活的实况。我要以大学生身份，而不是以教授或研究人员的身份，去和学生以及教职工相处。可是与此同时，人类学者的身份给我的责任，却能防止我在我正研究的文化中于人前迷失自己。

在这项计划中，朋友和同事协助我努力解决关于身份的问题，他们问我：“如果有人问你，靠什么维生，你怎么回答？”“我能不能说，我没工作，因为我是学生？”我回答他们。我想，这是事实，虽然并非完全真实。

“没错，”有个同事同意我，“但是如果他们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我就告诉他们，我做过很多事，事实上也真如此。我可以说，我现在还是个作家，此外我仍然在领最新一本书的版税。”

“但是，如果说，你还做过什么？”一名同事逼问。

“好吧，我希望他们不问我。不过我想，这时我必须告诉他们，我教书，也做研究。”

朋友继续以学生的口吻与我模拟对话：“那么你的专业是什么？”“我没选专业。”“你的家乡在哪儿？”“我在纽约出生长大。”“那你为什么选择进‘某大’？”“我要体验大学生活，因为我是个作家，也是个学生，同时这所学校离我家近。此外，我喜欢这个镇，附近的山，附近的环境。”我回答他们。这些全都

不假。

结果却是，这些关于身份的演练毫无实际意义。在日常对话中没有任何人直接问我的身份。只有一人例外，我向那人吐露了全部实情。有两个学生朋友后来向我坦白，想到像我年纪这样大的女人住在学生宿舍，他们就感到难过。他们不想问我问题，生怕会听到可怕的离异故事。

我在进行正式访谈时，永远严守学术研究的规矩。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执行以大学生活为对象的研究计划的研究员，并想把研究结果出版，公之于世。我把关于研究计划和研究意图的书面描述交给受访者，并要求他们签字，同意进行访谈。尽管我的许多研究对象把我当作研究员学生，不过我怀疑，他们也许觉得，我的研究目标以及将研究结果出版的动机，只不过是痴心妄想与学术上虚张声势的混合体而已。在后记《伦理学与民族志》中，我探讨了我在研究中的身份以及关于身份是否公开的问题。

坠入深渊

我首次真正坠入大学生活是在2002年6月。当时我去参加暑期“学前适应性训练”，每个新生都必须经过这个训练。两天里事务密集，包括在一栋新生宿舍住一晚。我们接到通知，每人都要带睡袋、毛巾和枕头进入学生宿舍。两个人一间宿舍，家长住的房间在大楼另一边，与学生分开，不过他们有床。

当天，我在早上8点就到达了这栋巨大的学生宿舍大厅外，等候登记。我仔细想着该怎么穿着，于是我有意识地穿得随便：粗布

短裤，有领子的高尔夫衫和棒球帽（学校建议我们要准备帽子），运动袜，以及一双不太新的慢跑鞋。像其他新生一样，我背着睡袋、枕头和过夜的物品，尴尬地夹杂在新生行列中，等着领取钥匙和分派室友。“对不起，女士。”在服务台工作的一名扎着金黄马尾辫的高年级女生，手指着另一边对我说：“家长请到那一边。”“不是，”我用理解的微笑回应说，“我不是家长，我是新生。”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一群家长在大厅等候着。那些人里面一半以上也穿着粗布短裤，或运动短装，以及圆领的高尔夫便装，戴着篮球帽还穿着运动袜和慢跑鞋。而我这边的学生穿的却是人字拖、牛仔裤、无领的汗衫。态势很明显，我对文化的触觉早已过时。

“哦，好抱歉！”那个办事的女孩说，“你原来是来参加‘学前适应性训练’的，好酷！那你和珍妮弗一间。”她指着站在我前面、同样扎着金黄马尾辫的女生说。她实际上是来自休斯敦的大学生，未来想读健康科学。我看见她的脸上很快掠过一丝强忍的不安，但是她很快镇定下来，对我微笑并打招呼。我内心一阵歉疚，这个可怜的新生入学第一天就抽着一个老女人作为室友。不过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合理展开对话，谈谈各自的学科、这两天的项目以及为什么要选择读“某大”。

接着两天里，我发现了不少大学的事，而在过去我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参加了一些说明会，它们涉及伙食计划、课程注册、如何取得助教指导和信息服务、不同的学费支付方式，以及如何安排作息时间。林荫路上有为新生放置的桌子，上面标示着校园里的各种服务与社团。作为新生，这一切让我眼花缭乱；作为教授，我惊

奇地看到，三方面的事物主导了校园的景象，并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它们分别是兄弟会和姐妹会、宗教组织团体以及商业性质的服务。我是人类学学者，又是个教授，但我对学生的校园生活竟然知之甚少，我对此感到惭愧。

除了家长和学生共同参加的这些说明会外，正式的“学前适应性训练”还提供暖场活动、高年级学生的小品表演以及只有学生参加的讨论会。我们学生站着围成圆圈，互相投掷沙包，在每次抛给别人时要叫出对方的名字，借以互相熟悉姓名。我们观看了许多警示性的学生小品——关于艾滋病、约会时被强奸、喝酒等。我们也被要求去思考一些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遇到的社交情形，比如，室友是个同性恋，这人在宿舍门外贴了张粉红色的三角形以表明身份，那该怎么办？又比如，在下面两件事中，你认为哪件是不恰当的：一个坐轮椅的学生坚持不肯被分配到二楼宿舍，或是老师总是让一个非洲裔美国学生（黑人学生）告诉全班：“作为黑人会怎么想？”

尽管有多种多样的活动设计，但作为人类学学者的我看得出来，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体验中，有着某种“剧本”存在。首先，我们会遭遇到富有争议，常常又是令人激动的迷人议题。接着，往往在一个小组中，我们会被要求去思考，我们如何考虑这个议题以及我们个人在这种处境之下会怎么做。小组带头的人会要求我们每个人对这件事发表看法，并会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结果总是在他人表达意见时，整个小组礼貌地倾听，无论那人的想法如何。当最后一人说完后，这段就算结束，没有对谈，也没有讨论。这种类型的智力性表达，使我意识到在大学生活中我